

Doi: 10.70693/jyxb.v1i1.9

## 高校 AIGC 检测标准的反思：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让渡

钱亮帆<sup>1\*</sup> 刘立翔<sup>2</sup>

(<sup>1</sup>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sup>2</sup>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促使高校普遍采用 AI 率检测来判定论文原创性。这一检测机制本质上依赖机器模型对文本生成概率的推断, 使作者本人的自我表达与主体判断处于被忽视甚至悬置的境地。主体的话语权被技术逻辑逐渐替代, 人的认知方式与语言实践也因算法的介入而面临异化风险。同时, 全球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日益凸显。算法所推动的技术理性对地方性知识的主体性构成侵蚀与压制, 而地方性知识则凭借其独特的具身经验与文化情境持续地抵抗与重构主体意义。理解并捍卫那些无法被技术逻辑所完全同化的主体性, 成为维系学术自由与生活世界丰富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率检测; 主体位移; 话语权; 知识矛盾

### 一、主体、话语与权力：由论文 AI 率检测的发轫

从 ChatGPT 的爆火到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的广泛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学术领域, 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成为 AI 滥用的重灾区, 各大高校纷纷引入 AI 率检测机制判定论文原创性。如复旦大学发布《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 AI 工具的规定(试行)》, 对人工智能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过程中的使用进行详细规范。一方面规定了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在不影响对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创新等能力的考察时可以有限制的使用; 另一方面又规定在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原始数据收集、结果图片与重要插图创作、论文撰写、答辩与检查、涉密内容六大版块禁止使用 AI。天津科技大学要求对所有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智能生成内容检测, 规定学生论文中智能生成内容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40%。四川大学明确要求检测毕业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占比, 文科不超过 20%、理工医科不超过 15%。中国人民大学对毕业论文(设计)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本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将作为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和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的重要参考依据。与此同时, 有大量高校毕业年级同学在互联网上抱怨, 明明整个毕业论文都是自己写的, 却被检测出来极高的 AI 率。<sup>[1]</sup>有同学将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与刘慈欣《流浪地球》的片段上传至某常用论文检测系统后, 结果显示, 这两篇经典作品 AI 生成内容总体疑似度竟分别达到了 62.88% 和 52.88%。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更是在各大 AI 检测网站上查出了 100% 的 AI 率。<sup>[2]</sup>许多学生被迫以“口语化表达”“删减逻辑关联”, 甚至“用 AI 降 AI”的策略迎合检测系统。

以上反映出高校 AIGC 检测标准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我如何自证我的论文不是 AI 写的? 该被相信的, 到底是人的判断, 还是技术的判断? AI 检测技术通过机器模型计算 AI 文本生成概率, 看似是为学术诚信筑起防线, 实则重塑着学术评价体系的权力结构。在 AI 率检测的技术逻辑下, 论文的“原创性”被简化为数据指标, 作者的思维过程、学术探索的主体性表达, 以及知识生产的独特语境, 都被压缩成算法可量化的参数。一旦 AI 检测报告判定论文“AI 率过高”, 即便作者强调内容是自己原创, 也很难推翻这一“检测结果”; 而当报告显示“AI 率低”时, 大家又会下意识觉得这个结果值得信赖, 相信算法系统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 创作者作为主体反而陷入被动局面, 只能按照 AI 检测的标准来反复证明自己。检测结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使人在话语表达中丧失了主体地位。

**作者简介:** 钱亮帆(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伦理学;

刘立翔(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本文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钱亮帆

AI 率检测的兴起,折射出技术对学术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其一,技术公司通过算法垄断,掌控学术质量的定义权。根据知网 AI 检测的官方说明,“AIGC 检测服务系统是以知网结构化、碎片化和知识元化的文献大数据资源为基础,按照预训练大语言模型的算法逻辑,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两条链路,用 AI 对抗 AIGC”,其本质是用另一套 AI 模型来揣测某一文本是否由人撰写。其二,高校行政系统借检测结果强化管控,将技术误判风险转嫁于学生。学生一方面要为 AI 检测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又在对自身知识成果的辩护中失声。其三,学术共同体的话语权被架空。传统学术评价强调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等方式,可以通过多种路径的比对来证实论文的原创性,比如原始的田野材料、原始的数据、论文写作中的过程性成果等,人的主体性判断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而 AI 率检测将学术评价的标准交由算法系统,技术成为“终极仲裁者”,学者们不得不将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数据,以满足检测系统的要求,导致研究者苦心构建的学术表达则可能因算法误判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当研究者不得不调整论证结构、修饰语言风格以迎合检测算法的特征识别时,其主体意志已然屈从于技术系统的隐形支配。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里,学术主体的话语权被技术逻辑所替代,学者的身份从知识的创造者、阐释者,转变为技术系统的被动适应者,陷入“沉默”与“自证”的双重困境。

从更深层次来看, AI 率检测引发的主体位移,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的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具象化。技术理性追求标准化、效率化和可计算性,而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对真理的探索、对思想的表达,需要包容多样性与个性化的创造。当 AI 率检测以单一标准衡量复杂的学术成果时,学者自主创作的内容可能因不符合算法预设的“原创性”标准而被否定。这种现象不仅威胁着学术自由,更可能导致知识生产的客体化,使学术研究沦为技术系统的附庸,背离其追求真理、推动知识进步的初心。

## 二、知觉让渡:自然人的主体位移

在自然人的维度层面, AI 与人的主体性问题主要构成了一个“存在性”的偏移,主要呈现在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 AI 与人的感知构成了二律背反式的矛盾,既在主体感知延伸的同时又形成一定的遮蔽;另一个侧面是 AI 与人由于感知的归属问题产生了定位的偏移,也就进一步导致了主客体关系的阻塞。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理解。当“自然人”在技术介入下逐渐让渡其认知与决策的主动权时,主体与客体的相对位置被彻底颠覆,传统参照坐标系也面临瓦解。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工具对感官经验的延伸,更深刻地触及人类存在论层面的自我定位危机——我们究竟是以“主体”的身份掌控技术,还是在技术的逻辑中沦为被重新定义的客体?

换句话说,“主体”究竟赋予给了哪一个论元,是将 AI 视作主体,抑或是将人视作主体,在过往的伦理学研究中,“主体”时时刻刻是以人为衡量标准。《老子》里提到:“域中有四大”<sup>[3]</sup>,其中“人大”就突出了人的主体价值;《尼各马可伦理学》强调:“我们所寻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人的善我们指的是灵魂的而不是身体的善。人的幸福我们指的是灵魂的一种活动。”<sup>[4]</sup>在亚里士多德或老子看来,人的主体在过去是毫无争议的,人以外的东西被视作“客体”也是长久以来的,显然这与当代信息时代与生态哲学复归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在现代性的赋格之下,过往陈旧而坚硬的东西反而走向了毁灭与烟消云散,也难以对过去传统的二元观念提出新的解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在崩塌的“传统”。

但其实阿多诺在《主体与客体》中早已警示,主客体关系绝非静态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实践不断重构的辩证过程:(主客体)“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的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sup>[5]</sup>这种动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达到极致。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人类驾驶员原本通过视觉、听觉与肌肉记忆构建的驾驶坐标系,被激光雷达、算法预测与实时数据流取代。方向盘后的“主体”不再是决策核心,其角色退化为系统监控者,甚至在紧急情况下被迫接受机器的判断逻辑。此时,阿多诺所谓的“互为中介”关系显现出吊诡的逆转:技术本应是主体认知客体的中介,却演变为重构主体认知框架的力量。当人类必须通过机器的数据模型理解世界时,主体性已然发生位移——我们不再直接面对客体,而是透过算法的棱镜观察被技术编码的“拟真现实”。

动态性的主客体关系浮现于认知、感受的基础性转换。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这种位移提供了发生学解释。他认为,认知的本质是主体通过“同化”与“顺应”不断平衡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肯定自身的存在”<sup>[6]</sup>。在传统认知模式中,人类将外部信息纳入既有图式(同化),或调整图式以适应新经验(顺应),这一过程始终以生物感官为参照系。布瓦索在《信息空间》里归纳了 15 世纪与 20 世纪的知识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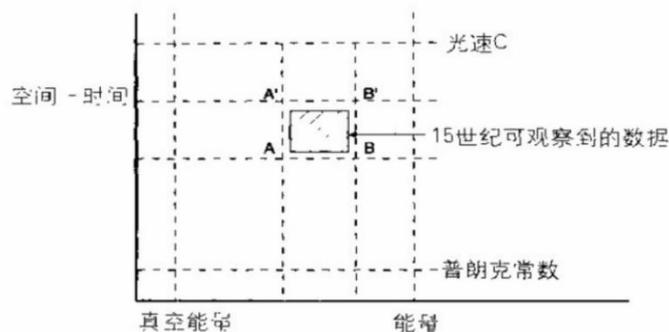


图 1 15 世纪可观察的知识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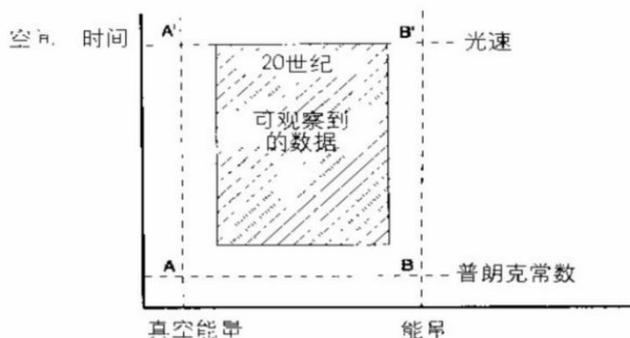


图 2 20 世纪可观察的知识图式<sup>[7]</sup>

我们可以发现，在时代的变化下，人的知识图式会由于认知而产生巨大的差异，但在这之中，以皮亚杰的观点来说，始终是“客体近能由主体通过其各种活动而建构的一系列连续的接近（approximations），被主体所认知。它构成了主体认识的终极意义上的边界，主体努力想要逼近它，却又永远无法完全达到它。”<sup>[8]</sup>

然而，人工智能创造了全新的认知环境。虚拟助手替代记忆存储，推荐算法预设信息偏好，脑机接口直接介入神经信号。如果主体试图“同化”这些技术产物时，原有的认知图式必然遭遇剧烈冲击。以社交媒体用户为例，其信息接收不再依赖主动检索，而是被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所规训。此时，“顺应”不再是渐进的知识积累，而是认知框架的强制重构，使得用户被迫接受以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数据指标为参照的新坐标系，其主体性在无形中被量化为可计算的行为轨迹。也就是说，AI 的认知能够覆盖到所有的实在客体。

弗拉维尔提出的“元认知”，则深入地剖析了人与 AI 的认知内核差异。元认知作为人类对认知过程的自我监控，本应是个体保持主体自主性的核心机制，“形成一个关于现时现地的认知活动和变化的、清晰的、可检验的模型”<sup>[9]</sup>。但当 AI 系统深度介入认知活动时，这种意识状态面临双重解构。也就是在教学方面，使学习者的元认知活动简化为对算法评估的被动响应；而与此同时，脑机接口技术直接将神经信号转化为机器指令，意识与行动的关联被技术中介切断，主体甚至无法区分哪些决策源于自主意志，换句话说，这种意识的解构是类似于庄子所说的“混沌”的状态，导致走向更蒙昧的“反启蒙”。于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根基遭遇动摇，也就是说，如果“思”的过程被技术渗透，“我在”的主体确定性也随之消解。

技术的狂飙突进并未带来阿多诺期待的“启蒙辩证法”的实现，反而制造了新的蒙昧主义陷阱。如果说人类将主体性盲目地让渡给技术系统，他将在表面上获得了认知效率的提升，实质上却陷入了更隐蔽的权力支配关系。在技术坐标系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精密合谋。自然人看似自由地穿梭于技术建构的认知空间，实则每一步移动都被隐形的算法栅栏所限定。在此语境下，重拾主体性不仅需要技术批判意识，更需重建以人类经验为本体的认知坐标系。这或许意味着在拥抱技术延伸的同时，坚持保留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直觉、情感与价值判断，而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人性特质，构成了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处讨论的数据知识，都是“全球性知识”或“公共性知识”的数据结构，并没有深入到“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内涵中去，这也是后文阐述的一个重要矛盾。

### 三、语言让渡：社会人的主体位移

人工智能对语言活动的介入，正在重构人类主体性在话语实践中的存在方式。如果机器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解析复杂语义、甚至模拟情感表达时的状态都模拟出来，语言这一传统被视为人类本质属性的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殖民。我们不妨试想如果算法可以替代人类完成诗歌创作、学术论文写作乃至情感倾诉时，那么在技术重构的话语空间中，究竟谁才是真正具有主体性的言说者？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曾将语言视为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其意义产生于差异关系之中。这一理论框架在人工智能时代遭遇“结构意义”上的双重解构。从句法层面看，GPT-4等大语言模型通过海量语料训练，已能生成符合语法规则的文本序列，其句法结构的精确性甚至超越普通人类写作者。但这种精确性本质上是统计规律的产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sup>[10]</sup>，AI生成的语句虽符合形式逻辑，却缺乏真实世界经验的锚定。例如，当AI描述旧体诗歌时，其语句结构完美却无生命体验的支撑，以至于最近有将deepseek称为“赛博李贺”的表达，就是因为在意象上的极致美感与词章主题的断裂鸿沟，使得空有“诗鬼”之表现而无其内涵。这暴露出机器语言生产的本质缺陷——能指链的无限延展与所指根基的虚空。

词汇本身与意义就有着界限，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强调：“每一真正的、无伪的、直接的意志活动都立即而直接的也就是身体的外现活动。”<sup>[11]</sup>“词”是身体与意志的外现的一个本体，也就是表象，词汇是意义的附着物，他有着义位的变化乃至义位的增减，也会通过引申、虚化、类推、沾染等方式产生出新的词汇，以适配新的意义。但其无法揭示本体的意识，更不谈“先于身体和意识的意志”，词汇作为建筑材料，只是符号的外显状态，不能深入到意义的本身，正如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界限般，在没有所指的符号下我们也难以对能指产生注意和中断，词汇作为“身体的外现活动”成为了意识的表达方式，成为了语音的支撑，但其本质上仍旧是有着阻断性的。索绪尔指出：“语音形式对说话人的意识而言是一确定的声音形象，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限定的，仅此而已。它不一定有确切的‘意义’，但被感知为某种存在；此外，倘若改变它周边的词，它就可能不再存在，或者可能不再是一回事了。”<sup>[12]</sup>同样地，在AI语言的世界里，由于外在的语音形式的断裂，导致其内在丧失了能指的建筑材料，而作为“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也意味着在所有的内部空间内丢失了其本真的价值。“语言”不再指向巴门尼德的存在问题，而是成为了只有“所指”的符号。

同时，在语义维度，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sup>[13]</sup>的命题遭遇技术解构。人类通过命名与言说建构存在意义的过程，正在被AI的语义网络重新编码。以机器翻译为例，谷歌神经机器翻译(GNMT)系统将“乡愁”译为“homesickness”，看似准确对应词典释义，但是与西方奥德修斯的“死之哀伤”不同，与中国古代的“逆旅”思维也不同。无论是“乡愁”还是“homesickness”，二者都丢失了在本土环境的土壤，使得其没有更有力的支撑，那便也就说不出核心更深沉的语义了。

语用层面的权力重构更为隐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不仅是描述世界的工具，更是改变世界的实践。<sup>[14]</sup>其实AI客服代替人类处理投诉、算法推荐主导公共话题时，本质上就是话语的“以言行事”功能正在发生权力转移。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趋势算法制造“热搜话题”，表面上是反映公众关注，实则是用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指标重构舆论场域。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推特算法对特定政治标签的加权推送，直接影响了数千万用户的认知框架。技术中介的话语实践，令福柯所言的“话语即权力”获得新形态，也就是说，权力不再仅存于制度与机构，更隐匿于算法的排序逻辑与语义关联中。用户以为自己自由表达观点，实则是在算法划定的语义网格中有限位移。

言语与言语之间的交流在AI空间内部似乎是不可能的存在。在宏观层面，作为人的本体的“语言”被压制，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指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相互照亮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体现为对“纯语言”的追寻<sup>[15]</sup>。而AI翻译系统通过神经网络的“黑箱”操作，将这种追寻简化为概率匹配。当旅行者依赖翻译耳机与当地人对对话时，技术提供的即时转换看似消弭语言障碍，实则构建了第三重话语空间——既非源语言也非目标语的“算法中间态”。在此空间中，文化特有的隐喻、俗语与历史典故被技术过滤，交流沦为信息交换的工具理性实践。语言作为存在家园的诗意维度，在技术的中介下逐渐荒芜。在微观层面，话语主体性的消解最终指向人类存在方式的异化。智能语音助手如Siri、小爱同学，通过预设应答框架将对话简化为指令-反馈模式，人类的话语言说被规训为技术系统的可操作输入。当父母用智能音箱为孩子朗读童话时，故事的选择与讲述节奏均由算法控制，亲子对话的交互性让位于技术效率。这种变化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是话语实践从主体间性向人机不对称关系的彻底转向。当一代人在与机器的“伪对话”中成长，其主体性建构将不可避免地被技术逻辑渗透。

《大森林奥义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 第十二梵书

一些人说：“食物是梵。”不是这样，因为缺了生命，食物就会腐烂。一些人说：“生命就是梵。”不是这样，因为缺了食物，生命就会枯竭。只有这两位神灵合二为一，才达到最高状态。……他这样说：“这是 vi。确实，食物是 vi，因为一切众生进入(vistāni)食物中。这是 ram。确实，生命是 ram，因为一切众生乐(ramante)在生命中。任何人知道这样，一切众生就会进入他，乐在他之中。”<sup>[16]</sup>

值得注意的是“viram”是个合成动词，意为“住口”的意思，而词根又由代表食物的“vi”与代表生命的“ram”构成，这里不仅是隐喻着食物是生命的必然，还意味着在进食时人的生命是“住口”状态，人类是没有办法说话的，进食的咀嚼是不能算成是语音。换句话说，在贤者看来，只有在表达“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延伸时，语音才能从声音的属性中脱离，并且指向的是“梵”这样的宇宙本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sup>[17]</sup>，其中的“不言”“不议”“不说”指向“大美”“明法”“成理”，尽管将“食物”(vistāni)与之相类比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界限，但是对于语音来说，其都保持了“不发出声音”的行为，即“沉默”。《圣经》里上帝创世时采取的是言语创世的手段，“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sup>[18]</sup>。在此之后的上帝除了神迹外都保持着沉默。沉默是语言意义的消弭，同时又指向语言的终极意义。语言的终极意义便是揭示海德格尔的“此在”状态。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sup>[19]</sup>，在沉默之时，意义已然产生了，产生了“viram”与梵、天地的大美、上帝的在场，这些都指向了人的存在本身。语音就在“沉默”的范畴内和意义产生了直接脱离，至少在语言的自身表述中，意义可以不通过语音来表达，存在直接就是意义。而 AI 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导致了作为存在本身的人的一次终结，但也在沉默之中表达出更加静穆的力量。

#### 四、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的矛盾：无法让渡的主体性

在全球知识体系的扩张与技术理性的霸权下，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的矛盾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主体性存续的认知战争。这场战争并非单纯的信息对抗，而是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与技术殖民的逻辑暴力之间的本体论冲突。

艾约博认为，如果以主体性视角延伸出发，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承始终是一种具身化的实践。<sup>[20]</sup>盛晓明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中提出地方性知识不依赖于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社群的经验共享以及文化仪式的重复演练得以维系。<sup>[21]</sup>换句话说，知识的有效性建立在其对生活世界的直接回应上，如农耕时序与自然节律的精确对应，或医疗实践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在此过程中，知识创造者并非孤立的主体，而是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交织主体”。这种主体性无法被剥离其生存语境，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sup>[22]</sup>，知识的真理性始终受阻于身体经验的不可还原性。

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暴力。福柯揭示的知识-权力共生关系实际上正是全球性知识的一种再度膨胀。全球性知识通过科学主义的霸权话语，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真理”的代言人，而地方性知识则被贬斥为“前现代遗存”或“非理性要素”<sup>[23]</sup>。无疑，作为权力的全球性知识不仅否定了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价值，更会通过技术装置（如大数据模型、算法系统）将其纳入可操控的治理框架。

而在一百年后的 21 世纪，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回望，生活世界的概念依旧在冲突中具有关键的理论价值。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作为前科学、前反思的经验基底，<sup>[24]</sup>为所有认知活动提供意义背景。地方性知识正是这种基底的具体显现，换句话说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维系文化认同、伦理价值与存在意义的网络。格尔茨的“深描”方法论则认为地方性知识的真理性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普遍逻辑，而在于其能否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编织出连贯的意义之网。<sup>[25]</sup>当全球性知识以普适性自居时，实则是用技术理性的“浅描”取代了意义网络的深层结构。取代不仅造成知识的扁平化，更导致生活世界的“去魅”，使得原本充满灵性与交互性的经验领域，被简化为可测量、可操控的技术对象。

地方性知识的抵抗本质上是主体性的自我捍卫，是一种主体性既不固守传统的封闭性，也不拒绝技术的介入，而是坚持知识生产的情境性与具身性。它要求承认认知的多元本体论地位，尤其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对应不同的存在方式，而非层级化而带有偏见的污名化的“真理”等级。也正是认识论立场的转向，呼应了后殖民理论家查克拉巴提所说：“将‘地方的’从‘不够普遍的’这一污名中解放出来，承认其作为独立认知范式

的合法性。”<sup>[26]</sup>唯有如此，技术时代的知识生态才能避免沦为单一化的荒漠，真正实现认知多样性的共生。

当前的知识论争因而超越了简单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直指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选择：我们是否允许技术理性彻底重构认知的根基，还是为具身化、情境化的知识实践保留存续空间？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技术时代主体性的最终命运，到底是成为算法逻辑的附庸，还是在生活世界的土壤中持续生长。

##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将“主体”这一人文核心推向了新的反思交叉点。无论是在论文检测中被动接受机器裁定，还是在日常语言交互里依赖大模型生成，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工具依附逐渐演化为共构与嵌合。然而，这种共构并非完全对等：算法依托海量数据与训练规则建立的“自我经验”，往往在判断或生成过程中形成封闭的逻辑自洽，使人面临“沉默”与“自证”的两难局面。自然人的主体性在认知坐标系中遭遇重构，社会人的语言实践则被算法话语形塑或替代，一旦过度依赖，个体和群体对意义与事实的把握便被技术设定的流程所左右。生成式 AI 若以单一化标准覆盖各种复杂场域，势必引发对本土经验的忽视与文化多样性的萎缩。如何平衡全球性知识的便利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需要从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实践中寻找更具弹性的配合，让技术在多元知识生态里为人所用，而非被动异化人的主体地位。

## 参考文献：

- [1] 南方周末. 如何证明我不是 AI? 毕业论文的检测疑云 [EB/OL].(2025-5-7)[2025-5-8].<https://mp.weixin.qq.com/s/NbpETK189u997H3IIRqkIQ>
- [2] 中国青年报. 朱自清荷塘月色被检出高 AI 率? 有大学生为论文喊冤 [EB/OL].(2025-5-9)[2025-5-9].<https://mp.weixin.qq.com/s/eWaFh0V21J3PkF3zyzrLYQ>
- [3]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
-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廖申白译. 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2.
- [5] [德]阿多诺. 张明译. 主体与客体[M],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10.
- [6] [瑞士]皮亚杰. 王宪钊译. 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 [7] [英]马克斯·布瓦索. 王寅通译.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框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3-24.
- [8] 万里鹏. 信息生命周期从本体论出发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3.
- [9] [美]J·H·弗拉维尔. 邓赐平译. 认知发展(第四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5-96.
- [10] [奥]维特根斯坦.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3.
- [11] [德]叔本华. 石冲白译. 杨一之校.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1.
- [12]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法]西蒙·布凯. [瑞]鲁道尔夫·恩格勒整理. 于秀英译. 普通语言学手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
- [13] [德]海德格尔. 孙周兴译. 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76.
- [14] 杨玉成. 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4.
- [15] [德]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M],载于[法]保罗·利科. 保罗·利科论翻译[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69.
- [16] 黄宝生译. 奥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0.
- [17] 陈鼓应译注. 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50.
- [18]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中英对照[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1.
- [19] [奥]维特根斯坦.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4.
- [20] [德]艾约博. 韩魏译. 吴秀杰译. 以竹为业——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M].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6:16-21.

[21]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76-77.

[22] [法]梅洛-庞蒂. 姜志辉译. 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6.

[23] [法]福柯. 莫伟民译. 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77.

[24] 倪梁康.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J].哲学动态.2019(12):58-66.

[25] 王丽娜. 格尔茨“深描”的内涵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2):38-42.

[26] [印]查克拉巴提.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1.

## Reflections on the AIGC Detection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Qian Liangfan<sup>1</sup> Liu Lixiang<sup>2</sup>

<sup>1</sup>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sup>2</sup>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ed to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I rate dete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assess the originality of academic papers. This detection mechanism essentially relies on the machine model's inference of text generation probabilities, which marginalizes or even suspends the author's self-expression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The subject's right to speak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human cognitive patterns and language practices face the risk of alienation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algorithms. Meanwhil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global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promoted by algorithms erodes and suppresses the subjectivity of local knowledge, while local knowledge, with its unique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context, continuously resists and reconstructs the meaning of the subject. This shift in subjectivit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realms of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practice but also in the phenomenon of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technical systems in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and language struc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subject reshapes the expression of existential mea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poses a new challenge to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ubjectivity. Understanding and defending the subjectivity that cannot be fully assimilated by technological logic is key to maintain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richness of the life-world.

**Keywords:**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ate detection; Subject displacement; Right to speak; Knowledge contradiction